

格、为人和工作作风以及个人经历有明显不同，形成强烈反差外，在对伪满的殖民统治中所起的作用则是完全相同的，在关东军眼里，他们都是合格称职的“总务长官”，若说不同，只能说驹井德三为“总务厅中心主义”确立了基本框架，而武部六藏则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奴役的发展，使之更精细罢了。

日伪政权垮台前后的武部六藏

王文铸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14年期间，伪满洲国的实际政治统治中枢是伪总务厅，武部六藏即是最后一任伪总务厅长官，也是任期最长的。1940年8月，武部六藏接任伪总务厅长官直至1945年8月日伪政权垮台为止，达5年之久。此期间正值日本侵略者发动太平洋战争，日伪政权走向穷途末路，面临灭顶之灾之际。武部六藏上任后，便公然规定强化总务厅中心主义，变本加厉地强化推行、重新制定各项殖民统治政策和法令，把伪满洲国牢牢地套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车之上，在亚洲充当反苏、反共、反人民，发动侵略战争的小伙计，忠实地为法西斯殖民主义政策效力。3000万无辜的东北人民处于更为残酷的殖民统治之下，东北被当作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桥头堡，献出了宝贵的物力和财力。武部六藏以牺牲中国东北为代价，为日本侵略者的垂死挣扎，效尽犬马之劳。

1893年1月，武部六藏生于日本长崎县，后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曾任县知事、关东局总长、日本内阁企划院次长代理总裁等。1940年东条英机出任日本首相，在其组建

新内阁时，将其亲信第六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星野直树召回日本国内任无任所大臣兼内阁书记官长。这样，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一职出现了空缺，对于这个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行政上的最高统治者的选派，是直接关系到“日本帝国利益”的重要人事安排，所以挑选十分严格，慎之又慎，最后选中了武部六藏。因武部曾任关东局总长，具有殖民统治的经验，并了解和熟悉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是一个政治手腕高超笑面虎式的人物，善于收买人心的伪君子。外表上看，武部六藏没有殖民统治者的架子，待人接物，是谦恭有礼、和颜悦色，讲话总是慢条斯理、从容不迫，但其在殖民统治，殖民奴役上是残酷无比，不择手段的。基于此，武部六藏被任命为第七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

根据伪国务院官制，伪国务院下设的总务厅是伪国务总理的幕僚机关。主要处理伪国务总理主宰的“部内的机密人事、主计及需要的有关事项”。总务厅长官辅佐总理大臣。但实际上，总务厅控制国务院，是国务院的核心，总务长官控制总理大臣。因此，关东军司令官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总务长官则是伪满国务院的实际“总理”。

伪满洲国颁布的法令、政策，必须经过总务长官在每星期二主持召开“火曜会”（1937年以后正式定名为次长会议）上裁决后，才能拿到国务会议上无条件通过。“次长会议”实际上是内阁会议，凡是伪满的一切政令、法令都出自于此。“次长会议”是以总务长官为议长，以总务厅次长、各部次长、关东局参事官、总务厅八大机构的局长为议员的具有绝对权威的国务会议。日本关东军第四课长（一般由关东军参谋长兼任）出席并监督会议进行，拟定的议案要绝对贯彻日本侵略者的意图。

武部六藏出任伪总务厅长官后，又进一步加强了“次长会

议”的绝对权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殖民统治、经济掠夺等方面的作用。除了按时召开定期的次长会议之外，还经常召集临时的次长会议。武部六藏首先强化了伪总务厅的内设机构，将原企划处升格为企划局，负责制订适合殖民统治，扩张侵略的各项政策、制度、法令。同时将伪军事部中的警务司升格为警察总局，直接隶属于伪总务厅，以此来强化其推行各种殖民统治政策和镇压东北人民的军事警察力量。

为了配合日本所发动的太平洋战争，使东北变成侵略战争的物质基地，武部六藏主持制定了《治安维持法》、《时局特别刑法》、《思想矫正法》、《国防保安法》、《国防资源秘密保护法》、《产业统制法》、《金属回收法》、《粮谷管理法》、《国民勤劳奉公法》等等。

伪满后期，随着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扩大和升级，对战略物质的需求日益增长，东北作为日本战争资源的供应地遭到了更为疯狂的掠夺和搜刮。“金属回收运动”就是武部六藏采取的巧立名目搜刮东北人民的手段之一。

“金属回收运动”始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1942年4月8日，武部六藏在伪满政府公报上公布了《金属献纳处理要纲》，规定为支援“大东亚圣战”伪满洲国要实行金属回收。1943年8月23日，又以伪满政府的名义发表了《金属回收法》，以法律形式强制东北人民执行“金属献纳”。该法共有22条，对献纳的各个环节都做了明确规定。武部六藏一向认为金属回收运动与大东亚圣战的胜负紧密相关，对此极其重视。1943年8月，在伪总务厅设立了中央“金属回收本部”，由伪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任部长。金属回收给东北经济造成的危害是用数字无法计算的，它严重破坏了东北的民族工业；严重地破坏了文物古迹；造成人民生活的极大困难。

武部六藏所采取的一系列高压殖民统治政策，不仅没有挽救日本帝国主义失败的命运，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和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彻底崩溃。

1945年8月9日，苏联政府正式对日宣战，苏军分四路越过中苏和中蒙边界进入我国东北，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溃了日本关东军数十万最精锐的部队。

当日凌晨4时左右，关东军总参谋长秦彦三郎将武部六藏紧急召至关东军司令部，传达了苏军进攻的情况。武部闻听这一消息，预感到日伪政权的末日即将来临，但其绝不甘心，还要做一番垂死挣扎。

武部六藏从关东军司令部回到总务厅后，马上于早6时召集伪满政府各部次长等日系干部紧急会议，传达了苏联对日宣战和进入满洲国的情况，说明苏军已突破国境，正从东、北、西三面发动进攻之中，眼下日满军正在各地与之交战的战况。要求各部次长紧急在其各自所属部门拟定非常时期对策，并报告其结果。最后决定，今后的次长会议每天午前7时和午后2时各召开一次。武部六藏又根据次长会议上决定的《非常时期对策》，向各省长、新京特别市长，发出关于紧急事态与非常措施的指令。

接着武部六藏又马上找来伪总理大臣张景惠一起入宫觐见傀儡皇帝溥仪，告知其日苏开战情况。

8月10日上午9时40分，武部六藏再次被召至关东军司令部，得到的通知是“因作战需要，关东军司令部明日内移驻通化，希望皇帝以下政府首脑及特殊会社代表也一起行动。携带物品限于一只公文包，务请做好单身出发的准备。”

武部六藏又于同日下午召开的“次长会议”上，传达了迁都通化之事。武部又指使张景惠召开国务院会议及参议院会议，

他在会上传达了关东军关于迁都通化的决定。张景惠等人的内心对迁都通化是反对的。他们自知伪满政权没有任何民众基础，如果没等战事打起来，一枪一炮不放，就轻易放弃新京，更会丧尽人心。他们原本仰仗日军的威力，继续稳坐他们各自的宝座。可现在尚未与苏军交战就撤到通化，势必是前途未卜，凶多吉少。为此，他们真的不想走。他们还曾提议将“新京”作为不设防城。但由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口中说出的此乃关东军的决定，他们有谁敢提出异议又有谁敢不执行呢！

武部六藏同时将伪满政府划分为撤退和留守两部分：溥仪、张景惠、臧式毅、熙洽、吉兴、张文铸、邢士廉、阮振铎、于静远、卢元善、阎传綏等人到通化省临江大栗子沟办理政务；于镜涛、金名世、黄富俊、谷次亨等人留守长春。

在武部的授意下，张景惠等伪大臣，在逃离“新京”的前夕，主持召开伪满政府的“防卫会议”。决定实行伪满军民“总动员”，加强防空设施，协同“皇军作战”。更为可笑的是，这次实质上是伪满政权散摊的会议，还讨论通过了一项冠冕堂皇的《满洲国防卫法》！

8月12日，溥仪和张景惠等人一反过去出巡时威风凛凛的声势，个个犹如丧家之犬，偷偷摸摸溜进昏暗狭小的长春东站，登上了逃跑大栗子的列车。在大雨滂沱中，仅有武部六藏、松本益雄秘书官和吉长铁路局长等3人到站送行。

送走溥仪等人之后，由于关东军尚无战斗详报，武部六藏无法做出准确的形势判断，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只能反复地召开次长会议。

自8月11日以来，关东军再三催促武部六藏等日系次长尽速去通化。武部觉得关东军司令部还未迁移，如果贸然前往通化，说不准就会大难临头，直到得知日本陆军中央部决定要利

用通化地区山势险峻并利用在那里所修筑的军事设施，在中国东北与苏军形成对峙的局势，以寻找决战的时机。加上苏军进攻意外迅速，预计20日前后即将攻到新京。所以武部六藏决定乘14日晚10时发的列车前往通化。

8月14日晚7时半，一份机密快电送到武部六藏的手中。据电文称：日本已于当日接受波茨坦公告，决定投降。15日正午，天皇陛下将就此发表广播讲话，并且连内容都写出来了。

武部听见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像丢了魂似的，心中充满了惊悸和恐惧。但他毕竟屡经危险，老于事故。尽管此时的方寸已乱，但仍旧留有几分镇静。武部立即将日系官吏集中到总务厅长官室做了传达，并宣布中止当晚的通化之行。

8月15日中午，武部六藏的总务厅长官室内挤满了伪满政府、协和会、特殊社的日系官吏，当他们听到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广播后，决堤似地号啕大哭，极度的恐惧和绝望心情，交织在一起，使他们哽咽难止。

怎样收拾伪满洲国政府目前的残局，武部六藏又召开了“次长会议”。就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伪满洲国皇帝的退位，满洲国解体等问题进行了商讨。混乱之中，武部六藏还亲自修改了由企划局副局长高仓正起草的为溥仪准备的《退位诏书》，然后携带译成中文的初稿于16日，乘飞机启程前往通化，但因气流不顺又返回。17日，再次启程，上午10时半飞抵通化，执行日本政府和关东军的最后意图。

武部和在通化的张景惠等人一起乘由通化发的专列，急奔大栗子。17日午夜时分，在大栗子矿技工养成所的教室里，召开了伪满洲国紧急参议府会议。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伪参议府议长臧式毅、伪宫内府大臣熙洽、伪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伪侍从武官长张文铸、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等人，坐在由

四处找来的破凳子上，个个面无人色，连张嘴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室内被一种难以名状的沉闷空气所笼罩。武部六藏首先敦请“康德皇帝”溥仪退位。并将事先拟好的《退位诏书》初稿公布于众，其大意是因时局发生重大变化，康德皇帝不得不引咎退位。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退位诏书》的初稿中，竟然又顺笔写下了“仰承天照大神之神麻，天皇陛下之保佑”的套语。桥本虎之助带着满脸哭笑把此句一笔勾去了。

张景惠则以“国务总理大臣”的身份，随声附合地提出：“日本天皇陛下已接受波茨坦宣言，满洲国已失掉了存在的意义，应由皇帝自动退位，给予满洲国以最后的终结”等等。当说到将这种提案呈奏皇帝时，众大臣皆沉默不语。最后，伪参议府议长臧式毅率先表态，提案方才予以通过。

关于溥仪今后的安身之计，武部六藏又做了说明：经关东军再三交涉，日本政府已答复“对皇帝安危不能负责，但来日是欢迎的”，并在京都给溥仪安排住所，溥仪可由通化经平壤乘飞机去日本避难。

随后，武部六藏与张景惠、臧式毅、熙洽、吉冈安直出面，赴“临时行宫”觐见溥仪。“九·一八”事变后，曾积极“拥戴”溥仪出任伪执政的张景惠，又从他的怀中掏出了《满洲国皇帝退位诏书》，请溥仪在上面签了字。随即，溥仪在“临时行宫”的会客室，召开“御前会议”，举行伪满洲国皇帝退位仪式。

就在这退位的最后一刻，溥仪仍然没有丢掉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的习惯，他脸色发青，仅用两分钟就读完了由日本人草拟的伪满洲国“送葬词”——《退位诏书》。接着，武部六藏又用日语宣读了一遍。之后，溥仪在吉冈的面前谄媚说：“我太对不起日本天皇了，尽管我现在退了位，我还要始终如一和日本一德一心到底。”接着又巡视了一下面前的君臣，补充说道：

“本人基于日满一德一心之大意，现在退位，希望各位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有幸长生在世，想还能有再见的机会吧”。话一说完，溥仪就眼含泪水离开桌子，从右边走到诸位大臣的面前，与他们一一地悲悲戚戚握手致意。

溥仪退位，宣告了长达14年的傀儡戏的最后终结。退位仪式完了，武部又吩咐这位退位“皇帝”立即准备赴日，并告知溥仪已从伪满政府剩余的经费中拨出3亿日元汇往日本，作为溥仪在日本的生活费用。溥仪听罢，便当着武部、吉冈的面，声色凄楚地对诸大臣说：“我在满洲国没有把我应做的事情做好，实在万分对不住日本天皇。我这次到了日本以后，也盼望你们都能在第二批来到日本，那时我们再见吧！”

此时此刻，武部六藏已无心听取溥仪讲的这番废话。他所担心和考虑的是自身的命运与今后的出路。所以他马上由通化逃返长春。当时，苏军尚未入城。由南京政府派到长春的国民党部活动十分猖獗。一时间，“国民党接收长春政权”的喧嚣，充斥了整个社会舆论界。潜回长春的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对此时局十分关注，他以自己的名义，通过广播电台与蒋介石政府取得联系。然后，串联伪满各部大臣到公馆议事，筹划组成了“临时治安维持会”，由自己出任会长，“准备迎接蒋介石军队接收”。并“打算在苏军到达之前，尽快变成‘中华民国’的代表”。在维持会组成的过程中，张景惠感到仅凭几名大臣很难担此重任，遂恳请已经垮台的日本人参加指挥。日本关东军居然同意了 this 请求，派出武部六藏和协和会中央本部长三宅加入维持会。

然而，张景惠、武部六藏他们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苏联红军继续逮捕伪满大臣后，于9月24日首先逮捕了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等日系官吏。

武部六藏同其他日本战犯一起，被押送至苏联赤塔市附近的莫洛科夫卡收容所、伯力红河子收容所、伯力第45特别收容所等地关押。

1950年7月，武部六藏和其他968名日本战犯一起，在绥芬河由苏方移交给中国政府。7月21日，押运日本战犯的专列抵达抚顺，将日本战犯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武部六藏在关押期间，因患重病一直卧床不起，未曾参加任何活动。1952年的一天，武部六藏突发脑血栓而致嘴歪眼斜，半身瘫痪，病情危重。对他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战犯，管理所的医务人员以革命的人道主义，全力抢救，使其免于—死，待病情缓解后，又精心进行护理。

1956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公开审理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伪满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等28名战犯犯罪案。武部六藏因病未能提解到庭，经法庭裁定另派审判员前往养病地（沈阳医学院十病号）审讯。武部六藏对证人证词均表示“完全属实”。7月20日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武部六藏有期徒刑20年；同时裁定，根据其身体情况，提前予以假释，遣送回日本，1958年1月武部六藏病死于东京。

伪满总务厅长次长岸信介

王國玉

(一)

岸信介，日本山口县山口市人，1896年11月13日生。1920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1922年进入日本政府农商